

典读党史

# 韩愈并非“不知诗”

## ——《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十四)

阎晶明

作为一位深刻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政治家,毛泽东经常会用这样的方法分析各种问题,包括文学问题。对文学史上的人物,他自有自己的偏好,但更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分析他们的成就、地位和历史作用,绝不人云亦云。比如对韩愈,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唐代诗人,从中可以见出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辩证分析的特点。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那天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多个学术问题。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一些文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则首先强调指出: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这里就既肯定了韩愈的成就,也指出了他的不足。毛泽东话语里意指不可低估韩愈成就和影响

的观点。一个月以后的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讨论诗歌问题。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

也可以,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成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一方面指出韩愈之诗思想性不足,同时又反对后世有人把韩愈说成“不知诗”。事实上,毛泽东很清楚文学史上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一般认为,韩愈诗在唐诗里属于说理成分较重的,因此评价上就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诗。毛泽东认为,宋代时整个诗风都倾向于摒弃形象思维,多用典籍、典故去说事理,才是真正的不善于唐诗传统。这一观点,我曾在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长篇序文里读到过。钱锺书认为,宋代诗歌水平总体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的诗人,不尚从生活里寻找素材和资源,反而热衷于跑到故纸堆里寻找写作的灵感、意境甚至句子,认为古人的诗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序文中也提到了韩愈。认为韩愈诗歌就是唐诗里说理较重的代表。钱

锺书在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论文艺创作源泉的理论,证明宋代诗人其实是走了错把“流”当成“源”的弯路。进而还中西结合,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更是毫不隐讳地把古罗马经典视作创作的“唯一源泉”,不惜公然使用“偷窃”的概念来强调这种创作方法。要想让自己的作品放进图书馆里,先要把图书馆里的作品放到自己的作品里。这是一种风气。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愈的评价很近似于钱锺书。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毛泽东对一位古代诗人和一个朝代诗歌风尚的观察研究,是很专业的。的确,“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样的诗句的确说理,但也是可以流传千古的“金句”。在上海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书。可见他对文学的关心,已到了对文学史写作表示关心、关注的程度。他还对刘大杰谈到,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谈话过程中,刘大杰问毛泽东,唯心

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论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

这就是毛泽东对学问、学术研究的态度的,也是他分析任何人物和事物的出发点、落脚点。就其个人的造诣而言,辩证唯物论的态度是他始终都要强调的。当然,在辩证中如何统一,着眼于现实的考量而特别强调一方面,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形和要求作出判断与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把握度和如何理解这种评判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艺苑笔谈

电视剧《对手》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反间谍”故事。从李唐和丁美兮夫妻二人的人性、生活、间谍工作等,以及两人与我国国家安全局以专案组组长段迎九为代表的组织和团队之间的博弈,到我国国安最终的胜利,充分展现了正确信仰的力量。“好人”认知不同,走的道路不同,人的命运不同。“好人”也需要正确信仰,才能为社会、为人类做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电视剧《对手》多角度诠释了“好人”。

### 一、“好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需要好人,做好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电视剧《对手》中通过正反角色的“好人”形象,打破以往电视剧中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故事结局的手法,通过正反都是“好人”的角色,把故事精彩地展现给观众,让人们反思。

电视剧《对手》中敌对双方的“好人”的故事发展,是电视剧的基本元素。电视剧《对手》中无论是间谍李唐、丁美兮、许慧婷等,还是我国国安部门的段迎久、丁晓禾、黄海、朱慧等,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工作人员。《对手》以反派为主线,叙述了与“小家”、人性、信仰、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故事。剧中用真实生活反映了境外间谍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手段的隐蔽、残忍、复杂难辨等,从正反“对手”的角度展现了每个人物对待信仰、家庭、工作的态度及对自己理想、信仰、梦想场景的追寻。

电视剧《对手》中细腻刻画“好人”心理的变化,是突出剧中敌我双方“对手”精彩博弈的因素。李唐、丁美兮从事间谍工作时,心思缜密、手段丰富残忍、作案手法娴熟;在生活中,感情细腻复杂,每个生活细节都有“烟火”气息。我国国安工作人员段迎久、丁晓禾、黄海、朱慧等在工作中,思维逻辑缜密、心态沉稳细致、团队管理科学,年轻人员的思维和行为比较真实;在生活中,每个人物感情到位,对家庭和工作不能“两全”时,真实刻画了我国国安人员思维和认识。这部剧最精彩之处就是展现了“正反”人员心理上的执着、感应,就如“魔道”之间的心灵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反”人员几十年的对决,“对手”之间的感应,心理的变化,让这部剧成为观众热议、追剧的心理因素。

电视剧《对手》中用“好人”表现真实社会生活,是引发观众热议的关键。李唐、丁美兮、许慧婷等处处充满烟火气,子女教育、中年危机……这些普通老百姓面对的问题,同样出现在间谍的日常生活中。和平年代谍战类型的规定情境下,写出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也让观众对剧中人物更加感同身受。

### 二、“好人”的信仰决定人生命运

《对手》中李唐、丁美兮、许慧婷等人员起初也是优秀的青年人,有着正义和自己的信仰方向,但随着工作任务服务的主体和所做的事不符合人类社会规律、不符合组织与个人之间道德规律、不符合社会中人的成长规律,最重要的是信仰方向是否正确,决定了其最终的命运。李唐表面上是个出租车司机,老实、热情、懦弱,对待“妻子”关心和呵护,对待远方的“女儿”和身边的“女儿”有爱心有耐心,对待“家庭”很关心和爱护,为了生活奔波,在社会上看起来像个“好人”。但作为间谍,他杀人、偷窃等,做了大量破坏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坏事,属于坏人。李唐、丁美兮、许慧婷等最终落网关键是信仰的坍塌。他们看到了其组织所追求的信仰、奋斗目标以及所做的事和现实不符合,不符合社会进步,不符合人类和平发展,也看到了他们组织的残忍、腐败等,反观我国国安人员的正气、信仰,为人民的平安和人类和平作出的努力、牺牲和贡献,特别是对待敌人家属也能做到平等对待,功过是非清楚。决定正邪双方胜负实际上是信念和信仰的对决。同时,该剧营造“间谍可能就在你我身边”的警示和国家安全重要的提示。

### 三、对弘扬正确信仰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好人”是民族的脊梁,是社会的阳光,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不可估量。目前,中国发展正面临社会盘整期,在物质文明取得辉煌成就下,亟待加强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更需要好人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 「好人」也需有正确信仰

——对电视剧《对手》中「好人」的探析

武震鑫

量。目前,中国发展正面临社会盘整期,在物质文明取得辉煌成就下,亟待加强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更需要好人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一是树立和弘扬正确的“好人”观,建立新时代好人的标准。全社会都需要“好人”,需要“好人”引领坚守道德、怀抱仁爱,需要树立和弘扬正确的“好人”观,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好人”观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美德和优良传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亟须倡导的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践行“三贴近”原则,构筑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是彰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人性真善美的生动写照。人们眼中好人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会改变:一个是讲道德,守法规,洁身自好;一个是能正确处理利己利人利公三者的关系,乐于利公利他。

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宣传力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党内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问题。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提高防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必须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基础工程抓起,确保广大党员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信仰问题上都不犹疑、决不含糊、决不动摇。当前,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高度,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六个为什么”等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立场,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应充分挖掘利用党史军史蕴含的精神资源,帮助大家深刻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强国富民的道理;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

三是抢占“微时代”阵地,正确把控“微时代”主流价值观方向。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现阶段已进入“微时代”。“微时代”中因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公众无法确认每条信息都是真实的,而这些不辨真伪的信息会冲击主流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以正视听,净化“微环境”,这就需要加强新媒体管理;提高新媒体平台公信力;加大“微时代”内容管控;正确把控“微时代”主流价值观方向,构建责任体系防患未然;坚持落实法律监管功能。

(作者单位:中国文联办公厅)

评序专栏

# 为魏晋名士描绘群像

宁稼雨

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向后人展示,使人对其形成整体印象。魏晋文化的一切成就和耀眼光环,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赖于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积累叠加起来,所谓集腋成裘的结果。因此,拨开大的历史背景帷幕和光环,以人物为中心,把镜头聚焦锁定在那些魏晋文化舞台大戏中的明星演员和重要推手上面,应该是解剖并深入认识魏晋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渠道。

因为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差别,历史上对于魏晋文化暨魏晋士人的负面评价占据主导潮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的认知和评价。从近现代开始,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鲁迅、宗白华、王瑶、刘叶秋、李泽厚等名家对于魏晋文化和士人的一系列正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魏晋文化和士人的负面形象认识,也为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的重新认知评价开辟了先路。

我本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魏晋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算起来,从我系统研究《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开始算起,至今也有30多年了。但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问题性质的角度对魏晋时期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梳理剖析。如果说以往我本人对于《世说新语》乃至魏晋文化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什么进步和特色的话,我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基本吃透魏晋玄学思想潮流的基础上,把玄学思潮作为统摄理解魏晋文化各个方面的杠杆和钥匙;二是用大量《世说新

语》和其他魏晋文献中的故事材料作为解读诠释魏晋文化各种潮流的鲜活案例,增强形象感。但是,这样研究关注的是魏晋文化的主潮,以及各种从属于主潮的文化侧面。还没有从单个人的角度,以个体人物为单位来解析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这次从以问题为中心转入以人物为中心使我对于魏晋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机会。

大约三四年,我和《文史知识》一直在探讨在该刊开一个连载栏目的事情。责编孙永娟老师提出,《文史知识》有个“人物春秋”栏目,稿源不算多,但读者比较喜欢看,问我能不能尝试一下。我感觉这个角度对我虽然具有一定挑战性,但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心想这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以群像方式展示魏晋文化的机会,如同《清明上河图》《最后的晚餐》那样。

有了这些想法,我便尝试写了一篇何晏的样稿,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玄学方面的贡献,二是为政治自保固旧友的人格卑微。这两条故事以前本来是分别谈不同问题时使用的材料,但我发现将二者汇为一文,恰好可以展示挖掘何晏其人的性格矛盾。文章写好后获得编辑部的认可,从此便正式在《文史知识》拉开“魏晋人物谈”大幕。

大约是在完成两三篇稿子之后,主旨思路和整体规划大体明确了。首先,从主旨思路,打算用我本人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统领全部文稿。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划分为先秦秦汉的帝王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士人文化、

元明清的市民文化三个时段。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流的突出表现就是士族文人从经济政治地位崛起群体人格独立,并由此催生中国文学的自觉和独立,乃至引发唐诗、宋词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魏晋时期以士人个体人格独立为标志的士人文化起步,是拉开灿烂的中国士人文化大幕的号角。通过当时一个个具体的人物群像个案描述来窥视揭示士人文化起步的独特视角和有效窗口。

其次,从“三段说”的主旨立论出发,力求用魏晋士人人群像为全面反映魏晋士人文化形成产生发展的形象历史。魏晋士人文化大致经历了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过渡,正始时期以玄学为中心的士人个体人格精神培育,竹林名士时期对于士人文化精神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生主题的实践,元康名士在玄学“崇有论”统摄下追求物质享受和政治实际利益的人生态度,东晋名士以“身名俱泰,任隐兼修”为宗旨的人生价值追求,构成魏晋士人文化精神的基本演变轨迹。而这个轨迹的形成,除了各种理论阐述,最能体现出这个轨迹演变线索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故事。以个体人物为单位的展示,正是全面诠释这些魏晋士人文化演变历程的理想色块。

出于这样的思路,从人选安排上,希望尽量体现出魏晋士人文化舞台的全方面貌。既考虑到士人文化中士人入选的主体比重,同时也考虑到各种社会人物身份对于士人文化形成的同步作用。比较典型的是部分帝王身份者对士人文化崛起和转折的推动对比作用。像

曹操、曹丕,不但身体力行,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广延文士,倡导文学。对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转变起到重要的枢纽推动作用。而晋简文帝虽然是一位悲催苦涩的帝王,但却是一位成功的士人。他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形象诠释了士人文化怎样取代了帝王文化……通过云云总总的时代群像,力争立体而全面折射反映魏晋时代士人文化崛起的生动写照,反映魏晋群英的真实图像。

第三,经过40年的努力经营,《文史知识》培养了相对稳定的特定读者群。这个读者群覆盖了专业学者和普通文史爱好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媚俗,渴望接受真知、新知。这就要求作者,既要把表达的内容全部了然在胸,又要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这个要求对我来说虽然不能说驾轻就熟,但也还不是很陌生。经过两三篇的尝试,基本上能够掌握从材料梳理到结构安排,乃至行文落笔的全套程序。

以这种方式写人物,像是饮食中的精品快餐,虽然程序简单,但主要营养却不能少;它又像是绘画中的速写,线条简练,却需要生动传神。一个优秀厨师和画家,快餐和速写不但不会降低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相反应该能够检验他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变换手法和思路进行重新组织和表述的能力。

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实现预想的初衷,给读者献上一份看得进去的魏晋名士图像。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魏晋名士月旦评》前言,该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新知书架

### 《岁月华影》:大家小书,雅俗共赏



本书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书中既有“山中走兽云中燕”,又有“陆地牛羊海底鲜”,文风上至文言文的雅,下至白话文的俗。大家小书,雅俗共赏。《随笔与悼书》《读书与治学》《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篇篇别致精巧的小文章,嬉笑怒骂,万态千姿,恰如万花筒中欣赏世间万物,如茫茫云海俯仰纷繁人间,是大智慧的精微表达,是真善美的高亮彰显。这些散文,也是周汝昌先生过往人生经历的浓缩。(谢颖)

### 《恰同学少年》:在赏画中品读诗词



日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恰同学少年——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该书选用了毛泽东同志的42首诗词,“梦”“忆”“春·雪”《水调歌头·游泳》等,配以42幅画家傅抱石的诗意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建院院长李洪峰从创作背景、革命背景、美学思想、艺术风格等角度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该书旨在让孩子们通过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优秀诗词,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革命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和伟大风范,树立远大理想,砥砺革命意志,培养优良素质,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张丽)

### 《抽象雕塑》:雕塑艺术的多元表现形式



《抽象雕塑》将于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张磊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在抽象绘画创作、抽象雕塑创作及理论研究、视觉传达设计、展览展示设计、景观设计等领域有一定成就。20世纪中叶至今,雕塑艺术经过了各种思潮和流派或剧烈或平缓的起伏跌宕、分离转合。本书在梳理抽象雕塑的源流之时,将着眼点放在19世纪末的欧洲雕塑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抽象雕塑经过一代艺术家的探索,业已取得长足发展,树立了我们深切地感到,未来需要从事抽象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不断探索超越。(郭海瑾)

